

朱提堂狼器考

吴小平 魏 然

【作者简介】吴小平、魏然，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(杭州 310007)。

【原文出处】《考古学报》(京),2021.3.365~380

【基金项目】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汉代铜器资料整理及其综合研究”(项目批准号:19ZDA197)的阶段性成果。

目次

- 一 纪地类朱提堂狼器
- 二 与周边地域性铜器的比较
- 三 无纪地类器的辨识
- 四 总体特征及其源头
- 五 衰落原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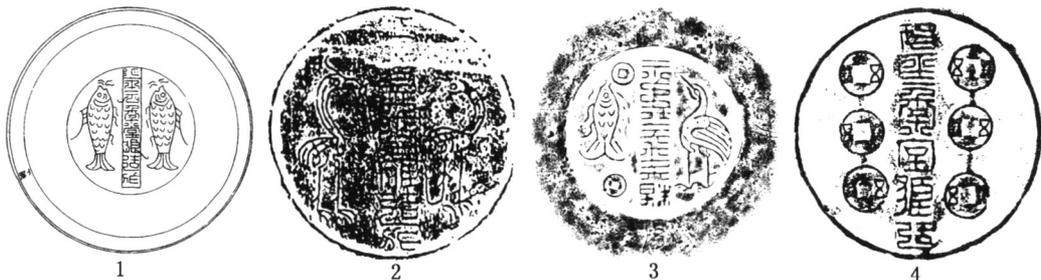
一、纪地类朱提堂狼器

所谓纪地类朱提堂狼器,是指铭文中确有明确的“朱提”、“堂狼”或“朱提堂狼”之类产地记载的器类。系统分析考古所出和著录的相关铜器(附表),可明了其时代、作坊性质及风格特征。

1.时代 目前所见时代最早者为“建初元年(76年)堂狼造”洗,时代最晚者为“熹平四年(175年)堂狼”洗,大致跨越了东汉早期后段至晚期^③。

2.作坊性质 根据四川通江博物馆藏的“永元元年(89年)朱提堂狼铜官造作”洗可知,朱提堂狼器在东汉早期后段便有铜官的设置。然今所见朱提堂狼器不乏纪年错误者,如“汉案元年(142年)堂狼造作工”洗,“案”乃“安”之误。再如“永建九年堂狼造”洗,永建年号实际仅到永建七年(132年)。年号和纪年的错误与其官营性质不符。结合这两件铜洗的时代来看,我们推断大致在东汉中期开始出现私营作坊。另外,通江博物馆所藏这件铜洗尺寸也与众不同,口径为67、高28厘米,而其他铜洗一般为口径

清至民国时期,朱提堂狼器已受学术界关注,端方、冯云鹏、容庚等都对其铭文和纹饰进行了著录^①。新中国成立之后,陈直、汪宁生、孙太初、方国瑜、徐正考等根据铭文就朱提堂狼器的制作时间、地望等问题进行了探讨^②。这些研究无疑为初步认识朱提堂狼器奠定了基础。但是作为汉代最为重要的铜器作坊之一,朱提堂狼不可能仅生产具铭的洗等几种器类,每件器物也不可能都有题铭或纹饰。如何完整认识朱提堂狼器,其文化特征、源头和衰亡原因尚需进一步探索。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,结合新公布的材料,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考述。



图一 纪地类朱提堂狼铜器纹饰

1、2.洗(山东章丘东平陵出土、四川宜宾南广乡出土) 3.盘(山东寿光纪国故城出土) 4.卮(湖北江陵城唐家山出土)

30—40、高13—18厘米,由此推断作坊仅少量为官营,大多数为私营,当然也不排除官营民办。

3. 风格特征 朱提堂狼器的铭文、纹饰、器类、形制都颇具特色。

铭文均为模铸。仅一例没有年号,即“堂狼造作吉羊”洗,其余均有年号和产地。如山东章丘东平陵所出“延平元年堂狼造作”洗。另有二例有简单吉语铭文,即“吉羊”。此外还有“阳嘉四年堂狼造作牢吉羊”。可见其铭文特征为年号和产地组合,吉语类不多见。

纹饰均在底模铸。根据题材和组合的差异,可分四类。

A类:双鱼纹。十四例。如山东章丘东平陵所出洗(图一,1)。

B类:双鹭纹。二例。如四川宜宾南广乡所出洗(图一,2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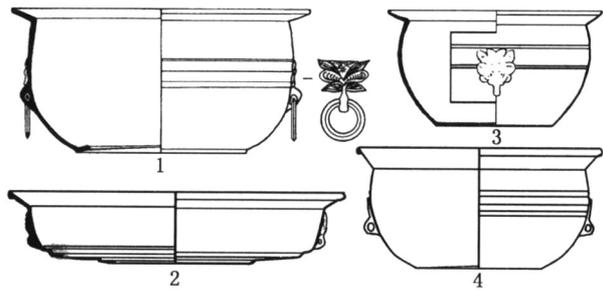
C类:鱼、鹭和钱币纹。十例。如山东寿光纪国故城窖藏所出盘(图一,3)。

D类:钱币纹。一例。湖北江陵城草市唐家山所出卮(图一,4)。

在各类纹饰中,双鱼纹和鱼、鹭鸟纹较为盛行。

器类有洗、卮、双耳锅、盘。其中洗有八十五例,卮一例,双耳锅三例,盘二例,洗占据绝对主导。考古发掘品公布的器形有限,下面仅做初步考察。

洗 敞口,宽斜折沿,深腹,平底。腹中部有数周弦纹,两侧置铺首衔环。口径约30、高13厘米以上。其形制变化大致可分两个阶段。东汉早期,沿面斜直,弧腹微鼓,如重庆忠县老鸱冲出土(图二,1)。东汉中期,沿面略内凹为浅盘口,鼓腹,如湖南吉首河溪镇、山东章丘东平陵出土(图二,3、4)。



图二 纪地类朱提堂狼铜洗和盘

1、3、4.洗(重庆忠县老鸱冲出土、湖南吉首河溪镇出土、山东章丘东平陵出土) 2.盘(山东寿光纪国故城出土)

双耳锅 深盘口,深腹,平底。沿面和腹部均施数周弦纹,口沿立环耳,如云南昭通邦家山、贵州安龙窖藏出土。

卮 敛口,弧腹,平底。腹部施数周弦纹,一侧置圆环耳。如湖北江陵城唐家山所出。

盘 宽斜沿,浅敞弧腹,平底,假圈足。如山东寿光纪国故城出土(图二,2)。

二、与周边地域性铜器的比较

对同时期周边地区的地域性铜器进行比较研究,可以更深刻地认识纪地类朱提堂狼器的风格特征。鉴于蜀郡和岭南所出铜器特征典型且分布地域明确,下面对这两地所出进行分析。

(一)蜀郡器

1. 考古出土器 出土的“蜀郡”铭文铜器较少,目前所见只有洗、盘两类。

洗 山东兰陵柞城出土一件,内底为麒麟、凤鸟和“蜀郡董氏造宜侯”铭文^④。湖南汝城城关镇出土一件,内底为双鱼和“蜀郡成都何师作富”铭文^⑤。安徽寿县安丰镇出土一件,内底为鼎纹和“蜀郡”铭文^⑥。湖南安化苍场乡出土二件,内底为麒麟、凤鸟和“蜀郡董是造作”铭文^⑦。浙江绍兴金刚庙出土一件,内底为双鱼纹和“蜀郡成都作”铭文^⑧。

盘 四川成都永丰社区出土一件,内底为“中平五年(188年)蜀郡工官造作周君吉羊宜王”铭文和鹭鸟、羊及云气纹图案^⑨。

2. 传世器 金石学著录中也不乏蜀郡铭文铜器,如《秦汉金文录》所著录的“蜀大吉利长留子孙”、“蜀郡严氏富昌吉利传子孙宜主万年吉羊”、“蜀郡严氏造作”、“蜀郡严是造传子孙”、“蜀郡董氏造宜侯”、“蜀郡董是作羊吉吉羊”等具铭铜器。

既然董氏、严氏、何氏均为蜀郡人氏,那么《秦汉金文录》所录以下诸器亦应属蜀郡器。如“董是器”、“董氏作”、“董氏造作”、“严氏作”、“严氏造”、“严氏造吉”、“严是□□子孙吉羊昌宜侯王”、“严是造吉羊”、“严氏造作吉羊传子孙宜主”、“严氏作”、“董是富贵”、“董是造作”、“董氏造”。若此根据作器者的款识,以下考古所出亦应属蜀郡。安徽霍邱出土的一件洗,内底为吉羊图案和“严氏作器”铭文^⑩。河南南阳博物馆藏的一件洗,内底模铸吉羊和“严氏

作”铭文^①。西安北郊高庙村出土的一件盘,内底为“严氏造作”铭文和蟾蜍、猴、虎图案;另一件内底为“严氏作”和羊纹^②。陕西临潼洪庆堡出土的一件盘,内底有“严氏作”和双羊纹^③。陕西宝鸡市博物馆藏的一件盘,内底为“董氏”铭文和羊纹^④。

3. 蜀郡器特征 根据上述器例可归纳蜀郡器的特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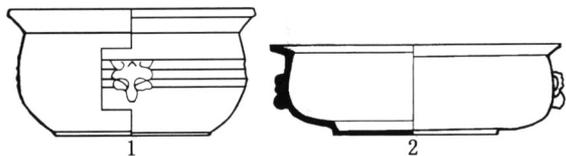
器类有洗和盘,以洗为主,盘的数量也不少。洗为敞口,折沿面略深,鼓腹,平底,腹部施数周弦纹,铺首位于中腹以下。如安徽寿县安丰镇所出(图三,1)。盘为敞口,斜折沿,浅鼓腹略垂,平底,假圈足。腹部两侧施铺首衔环。如陕西临潼洪庆堡所出(图三,2)。

纹饰均为模铸。纹饰包括以下几类题材。

A类:双鱼纹。三例。如湖南汝城城关镇所出洗(图四,1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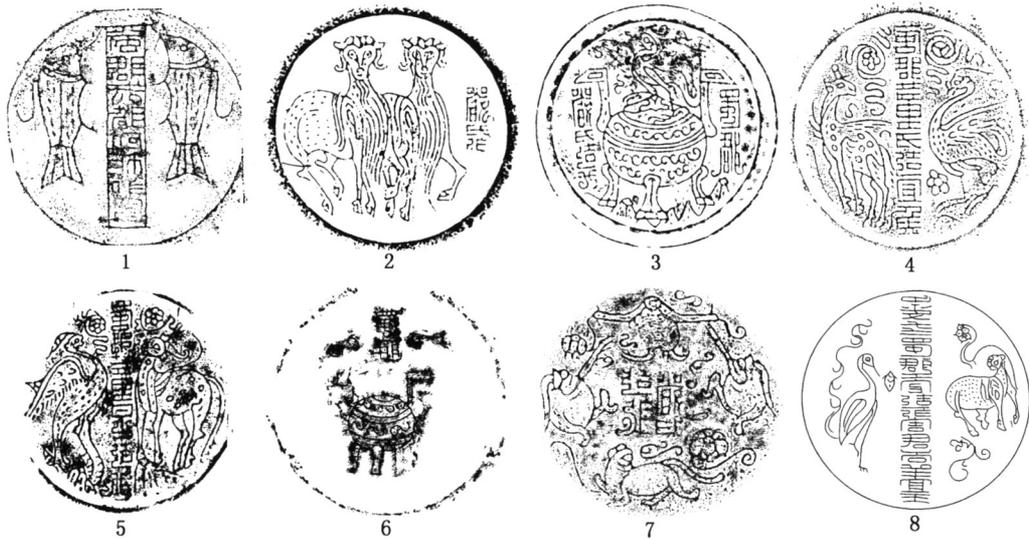
B类:羊纹。十一例。如陕西临潼洪庆堡所出盘(图四,2)。

C类:凤鸟和鼎纹。四例。《秦汉金文录》著录的



图三 蜀郡铜器

1. 洗(安徽寿县安丰镇出土) 2. 盘(陕西临潼洪庆堡出土)



图四 蜀郡铜器纹饰

1、3-7. 洗(湖南汝城城关镇出土、《秦汉金文录》著录,山东兰陵柞城出土、湖南安化苍场乡出土、安徽寿县安丰镇出土、陕西西安高庙村出土) 2、8. 盘(陕西临潼洪庆堡出土、四川成都永丰社区出土)

洗(图四,3)。

D类:麒麟和凤鸟纹。四例。如山东兰陵柞城、湖南安化苍场乡所出洗(图四,4、5)。

E类:鼎纹。三例。如安徽寿县安丰镇所出洗(图四,6)。

F类:猴、蟾蜍、凤鸟纹。二例。如陕西西安高庙村所出洗(图四,7)。

G类:鹭鸟和羊纹。一例。即四川成都永丰社区所出盘(图四,8)。

可见其纹饰种类丰富,其中以羊、凤鸟、鼎纹为主。

题铭 均为模铸。根据组合大致分三类:以姓氏为主,涉及有董氏、严氏、武氏、周氏等,数量很多;以产地为主,即蜀或蜀郡两类,数量不多;吉语类,吉语多样,涉及“吉羊”、“宜侯”、“富贵”、“宜子孙”等,组合也多样,铭文或短或长,最短的为“吉”,长的如“蜀郡严氏富昌吉利传子孙宜主万年吉羊”,有十三个字。其可再细分两小类:姓氏和吉语类,数量较多;产地和吉语,数量不多。可见其铭文特征为姓氏多,吉语多,未有年号,产地少。

我们将朱提堂狼器与蜀郡器进行比较,列表如表一。

不难看出,蜀郡器和朱提堂狼器最大差异在纹饰和铭文方面。不过两地铜器亦存在一点共性,可

表一

纪地类朱提堂狼器与蜀郡器对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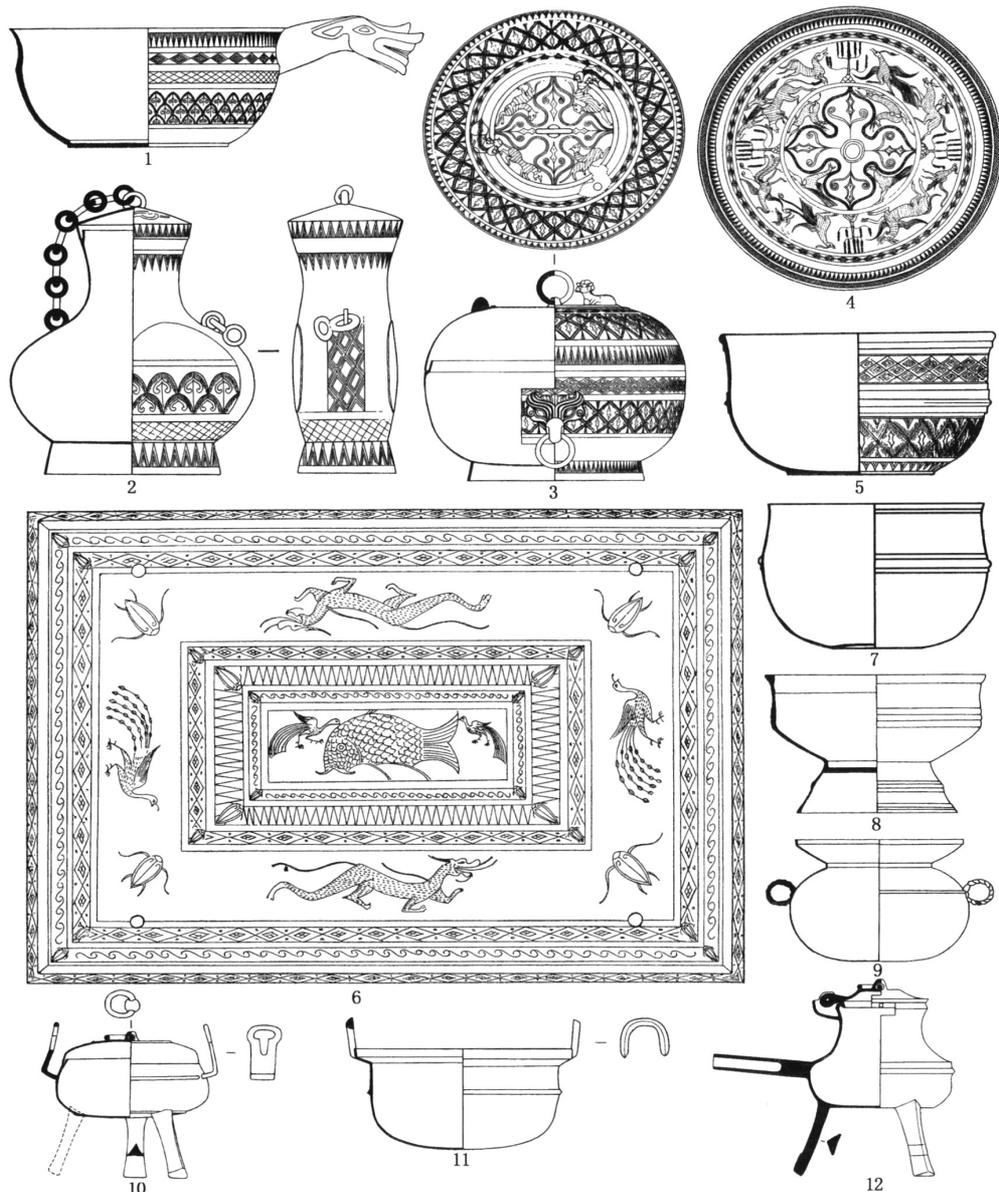
	器类	纹饰特征	铭文特征
蜀郡器	洗、盘	羊、鼎、凤鸟为主	多姓氏,多吉语,少年号,少产地
朱提堂狼器	洗、盘、锅、卮	鱼、鹭鸟为主	多年号和产地,无姓氏,少吉语

能与相互影响有关。如题铭方面,朱提堂狼器出现“吉羊”铭文,而此类吉语为蜀郡器常见;纹饰方面,朱提堂狼器常见双鱼纹,蜀郡器则发现较少。另外,铜洗的形制在东汉中西晚期没有太大差异。

(二)岭南器

岭南地区虽然未出土纪地铭文器,但依器物风格和分布特征,可知岭南确有大量本地制作铜器。

1. 器类 岭南器大致包括刻纹铜器和非刻纹铜器



图五 岭南铜器

刻纹铜器:1.魁(广西合浦望牛岭出土) 2.扁壶(广西合浦文昌塔 M015 出土) 3.盒(广西合浦母猪岭 M4 出土) 4.承旋(广西合浦母猪岭 M4 出土) 5.杯(广西合浦文昌塔 M51 出土) 6.案(广东德庆大辽山出土) 非刻纹铜器:7.杯(广西合浦 11HFPM12 出土) 8.碗(广西合浦岭脚村 M4 出土) 9.盘口釜(广西合浦凤门岭 M26 出土) 10.鼎(广西合浦 10HFPM1 出土) 11.双耳锅(广西合浦文昌塔 M53 出土) 12.铫(广西合浦 10HFPM1 出土)

两类。刻纹铜器,即表面篆刻细线的器类,有甗、扁壶、盒、承旋、杯、案等(图五,1-6)^⑤。非刻纹铜器,有杯、碗、盘口釜、扁足鼎、双耳锅、钗、铎等(图五,7-12)^⑥。

2. 铭文 岭南器有铭文的数量很少,为刻铭和墨书,罕见模铸类。铭文内容也难以归纳,涉及价值、所有者、产地、年号。目前所见仅有广东番禺 M8 出土一件碗,圈足内墨书“郡氏”,时代为东汉中南晚期^⑦。广西梧州旺步 M2 出土一件碗,外底刻“章和三年正月十日钱千二百”,时代为东汉中期^⑧。章和年号只有二年,“章和三年”系误刻。广东德庆大辽山所出二件洗、一件圆壶,一件外刻“谢著有”,另一件刻有“元初五年(118年)七月中西于造谢著脰”,一件圆壶,口沿刻“元初五年七月中西于李文山治谢著有”,时代为东汉中期^⑨。广西合浦文昌塔 M20 出土一件釜,腹部墨书“彭氏□□”,时代为西汉晚期^⑩。

3. 纹饰 均为篆刻,有羽状锦纹、菱形锦纹和神兽动物(图五,1-6)。

综上所述,岭南铜器无论器类、造型,还是纹饰、铭文风格均与朱提堂狼铜器迥异,二者不具可比性。

三、无纪地类器的辨识

从上文讨论可以看出,纪地类朱提堂狼器与周边地区的地域性铜器存在较大差异。朱提堂狼作为东汉时期重要的铜器作坊,不可能仅生产洗、盘、卮、锅四种器,也不太可能每件器物均标注产地年号或装饰纹饰。另外,生产的数量更不可能仅如附表所列的一百来例。因此仅仅依赖纪地类,不足以了解朱提堂狼器的全部面貌,对其文化特征的认识亦存在很大局限。为弥补这些不足,关键在于识别无纪地的朱提堂狼器。

上文讨论的纪地类器的特征为辨别无纪地类提供了标尺。鉴于铜洗与蜀郡所出并无太大差异,而纹饰和铭文特征更为明显。还可根据器物分布地进行推断^⑪。若器类主要分布在滇东北一带且外地罕见,亦可推断为朱提堂狼制作。事实上,朱提堂狼铜器无论有无铭文或纹饰,其分布主要集中在滇东北为中心的西南一隅。下面仅就西南地区所出进行讨论。

洗 基本分布在云南昭通一带,时代为东汉中期。四川西昌凉山州电视台基建工地出土一件,内底为双鱼和“永和元年(136年)李造作工”铭文^⑫;贵州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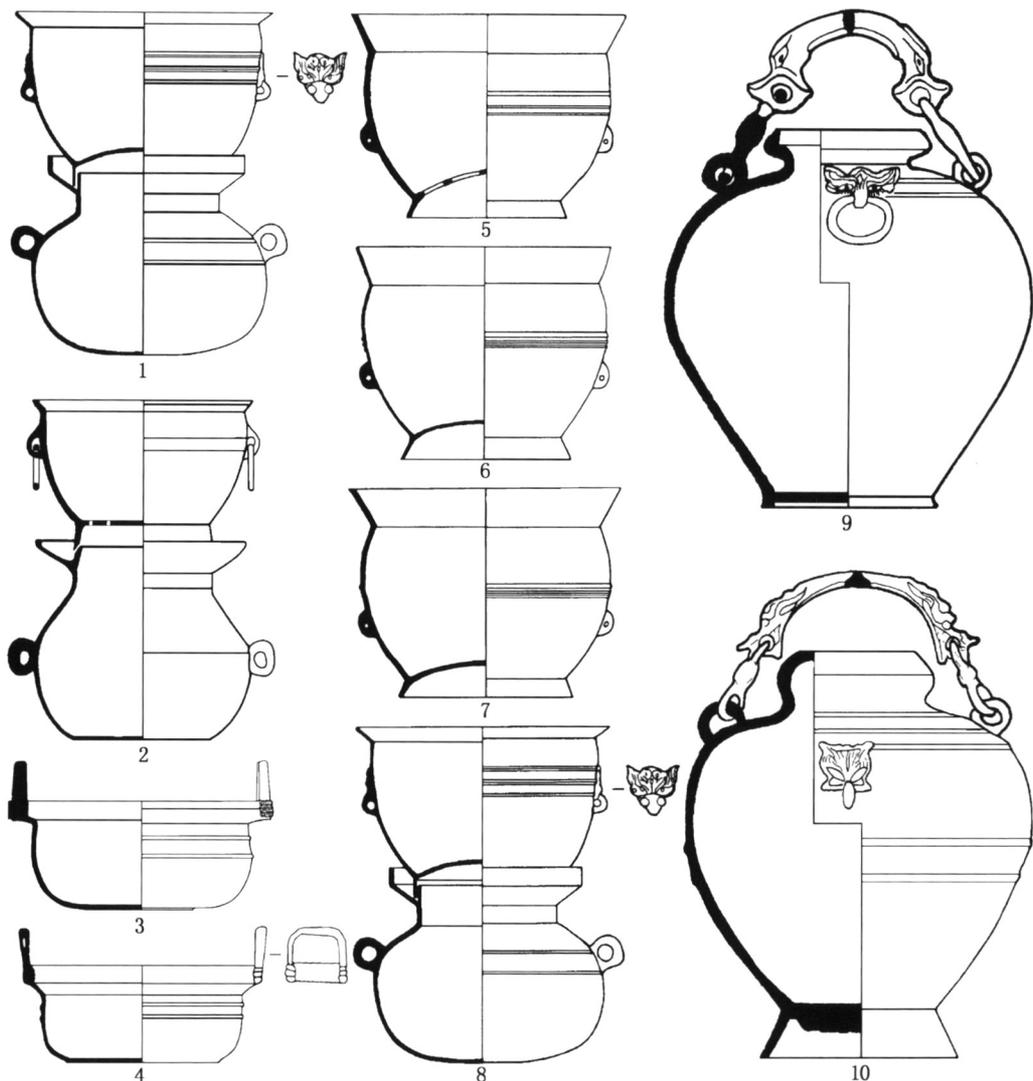
仁交乐 M7 出土一件,内底有单鱼纹^⑬;贵州务川镇南镇出土二件,分别为双鱼和单鱼、蔓草纹^⑭;云南昆明羊甫头 M96 所出内底为双鱼,昆明羊甫头采集第 305 内底有鸛、鱼^⑮;云南文山州砚山县采集一件,内底为双鱼^⑯;云南禄丰张通村出土一件,内底为单鱼纹^⑰;四川盐亭黄甸镇所出,内底有双鱼纹^⑱;云南昭通专区医院所出内底为鱼纹;云南大关岔河 M3 所出一件,内底有鸟纹;1953 年在昭通鲁甸大坪子村出土一件,内底有鹭鸟图案和“日千万”铭文;昭通文物考古部门收藏“永元八年(96年)造”。上述诸器纹饰或为鹭鸟纹,或为鱼纹;铭文或有年号,或吉语简单,显然其风格特征更接近纪地类朱提堂狼,而与蜀郡器差异较大。

盘 时代亦集中在东汉中期。如四川西昌杨家山 M1 出土一件,内底有单鱼纹^⑲;云南昭通白泥井村出土一件,内底为鸟纹^⑳;陕西勉县褒城镇所出为双鱼^㉑;云南昆明羊甫头采集 68,内底为单鱼^㉒;四川阿坝理县朴头镇出土二件,内底为鹭鸟衔鱼^㉓。纹饰主要为鸟或鱼纹,与纪地类朱提堂狼器相同。

双唇短颈釜 时代为东汉早期至东汉中期。四川西昌杨家山 M1^㉔(图六,1)、重庆巫山水田湾 M8(图六,2)^㉕、云南大关岔河^㉖、昭通桂花院子^㉗、昆明羊甫头 M316^㉘、贵州兴仁交乐^㉙均有出土。特征为双唇,粗短直颈,圆鼓腹,肩有对称环耳。其主要分布在云贵中北部一带,他地罕见。

双耳锅 时代为东汉中期。四川凉山州电视台基建工地^㉚、泸州^㉛、贵州兴仁交乐(图六,3)^㉜、云南大关岔河(图六,4)、昭通桂花院子^㉝、贵州黔西绿化乡^㉞、兴义^㉟有出土。集中分布在云南昭通附近,其特征为深盘口,腹略鼓,口和腹均有数周弦纹。昭通郑家山和安龙县城窖藏出土二例,均有“朱提”铭文,形制亦无二致。此类双耳锅起源于岭南,广西合浦风门岭^㊱、文昌塔^㊲、海南临高^㊳等墓地便有出土,时代为西汉中晚期至东汉中期。但对比可知,其盘口浅,腹深,与上述西南所出差异较大。

甗 时代为东汉早期至东汉中期。重庆开州区红华村^㊴、云南禄丰张通村^㊵、昆明羊甫头(图六,5-7)^㊶、四川西昌杨家山(图六,8)^㊷、贵州兴仁交乐^㊸、重庆巫山水田湾^㊹、云南大关岔河 M3、昭通桂花院子皆有出土^㊺,昭通文物管理所亦有收藏^㊻(图六)。此类甗



图六 无纪地类朱提堂狼铜器

1、2. 双唇短颈釜(四川西昌杨家山 M1、重庆巫山水田湾 M8 出土) 3、4. 双耳锅(贵州兴仁交乐 M6 出土、云南大关岔河 M3 出土) 5-8. 甑(云南昆明羊甫头 M268 出土、云南昆明羊甫头 M316 出土、云南昆明羊甫头 M419 出土、四川西昌杨家山出土) 9、10. 尊形壶(云南昆明羊甫头 YC:72、云南昆明羊甫头 M316 出土)

基本集中在昭通及其周边。特征为内底上弧，圈足外撇，与其他地区所出形制差异很大。

尊形壶 时代大致在东汉早期至中期。云南昆明羊甫头(图六, 9、10)^⑤、昭通白泥井^⑥、贵州兴义^⑦、安顺宁谷大寨^⑧、遵义乐山镇、四川兴文古宋乡^⑨有出土。器物特征为小敛口，短颈，圆肩，鼓腹弧收，平底，有圈足。肩部置提梁环耳。此类器集中分布在云贵地区的中北部，其他地区目前仅山东兰陵柞城出土一件^⑩。

鉴于上述器类基本分布在昭通所在的滇东北一带，外地罕见，部分器类风格特征与纪地类朱提堂狼

器相同，故推断为朱提堂狼制作。

四、总体特征及其源头

根据前文的讨论，朱提堂狼既制作有产地和年号的铭文器类，也不乏无题铭、无装饰的器类。综合这两类，可窥探朱提堂狼器的总体面貌。

器之时代，非纪地类的洗、盘、釜、锅、甑、尊形壶的时代主要属东汉中期，仅重庆巫山水田湾所出釜为东汉早期。纪地类的时代，根据附表可知，东汉早期有十五例，东汉中期为七十例，东汉晚期五例。可知朱提堂狼器起始于东汉早期后段，盛行于东汉中期，衰落于东汉晚期。主要分布在滇东北所

在的西南一隅。器类多样,有洗、盘、双唇短颈釜、双耳锅、甑、尊形壶、卮等类。纹饰种类不多,以鱼、鹭鸟为主,少量钱文,均在内底模铸。铭文内容简单,多“年号+产地”,吉语类少见。朱提堂狼器乃西汉中晚期以来云贵地区铜器发展变化的结果,体现为融合了云贵和周边地区不同铜器文化所形成的多元性。

(一)以云南个旧等地汉代青铜文化为基础

个旧等地汉代青铜文化为朱提堂狼器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积淀,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
朱提堂狼器中的短颈釜、双耳锅、甑、尊形壶均可在个旧找到原型。如短颈釜在个旧黑蚂井墓地出土十二件,双耳锅有一件,甑有二件,尊形壶有一件,时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,早于朱提堂狼器。

鱼纹在铜器上的使用,汉代最早出现在以个旧为中心的云贵地区。如个旧黑蚂井 M27 所出釜^⑤,贵州赫章可乐 M8^⑥和个旧黑蚂井 M26 所出短颈双耳釜,赫章可乐 M8 所出盆釜,赫章县 M7^⑦、个旧黑蚂井 89M4 和大关岔河^⑧所出刁斗,云南江川李家山 M86^⑨和个旧黑蚂井 M16 所出立耳平底釜,内底均模铸单鱼纹,时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。这种纹饰尚未发现于同时期其他地区。对鸟的偏好,为当地传统。战国时期铜器便开始使用鸟纹,如滇文化中的青铜器便大量出现孔雀、野鸡、鸳鸯、鳧等鸟类图像^⑩。

(二)周边其他汉代青铜文化为补充

周边尤其是川渝及关中地区的汉代青铜文化,对朱提堂狼器的形成有辅助作用。如铜洗,西汉时期云贵境内仅在个旧黑蚂井、赫章可乐、清镇出土七件,器形与朱提堂狼洗差异较大,并非其直接源头。但汉中和峡江地区的陕西紫阳白马石^⑪、重庆巫山双堰塘^⑫等所出,则与朱提堂狼洗风格接近且时代略早,推断为其源头。而铭文特征“年号+产地”的风格与关中地区有关。这种铭文风格最早出现且盛行于关中境内,如《秦汉金文录》著录有“骀荡宫铜壶,太初二年(公元前103年),中尚方造,铸工广”;陕西咸阳杨凌区出土一件行灯,铭文为“阳邑铜烛行锭,重三斤十二两,初元年(公元前48年)三月河东造,第三”^⑬。当然,朱提堂狼并非全部照抄关中,亦有改造,如铭文的技法由关中的篆刻变为模铸,铭文省略

了编号、纪重之类内容。吉语铭文的出现可能与蜀郡器有关,对此上文已经提及。

五、衰落原因

朱提堂狼器在东汉晚期衰落,其衰落原因可从两方面分析。

外因即其他地区铜器对朱提堂狼器的竞争。通过对蜀郡器和朱提堂狼器的出土状况考察,可以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,即蜀郡内基本未发现朱提堂狼器,同样,朱提堂所在的云贵境内亦几乎未发现典型的蜀郡器,这种现象显然与竞争有关。在其他地区,朱提堂狼器和蜀郡器亦展开竞争。

长江上游沿江地区所见朱提堂狼器有四川宜宾南广出土的洗,四川泸州出土的双耳锅,重庆忠县老鹅冲出土的“元和元年堂狼造”洗。蜀郡器有四川开县红华村出土的“富贵昌宜侯王”洗,朱雀、双龙纹盘,重庆丰都汇南出土的盘,万州金狮湾出土的祥瑞动物耳杯,万州武陵出土的西王母耳杯,巫山土城坡出土的凤鸟纹耳杯,湖北巴东出土的四神纹耳杯。

四川西昌境内所见朱提堂狼器有西昌凉山州电视台基建工地出土的“永和元年”双鱼纹洗、双耳锅,杨家山出土的单鱼纹盘、甑、釜。蜀郡器有杨家山出土的凤鸟纹洗、西王母耳杯。

汉中地区所见朱提堂狼器有陕西勉县褒城镇所出铭文洗、双鱼纹铜盘。蜀郡器有陕西汉中铺镇出土的四神耳杯。

安徽地区目前仅发现蜀郡器,有寿县安丰镇出土的鼎纹和“蜀郡”洗,霍邱发现的吉羊图案和“严氏作器”洗、单鱼纹和“王氏器”洗和吉羊纹饰洗。

关中腹地仅发现蜀郡器,有西安北郊高庙村出土的“富贵昌宜侯王”洗,“严氏造作”洗,蟾蜍、猴、虎图案洗,“宜子孙”双鱼纹盘和“严氏作”羊纹盘,临潼洪庆堡出土的“严氏作”双羊纹盘。

河南地区仅发现蜀郡器,有南阳博物馆收藏的吉羊和“严氏作”洗,桐柏平氏镇出土的朱雀、鼎纹盘。

山东地区发现的朱提堂狼器有兰陵柞城出土的“永元二年(90年)堂狼”洗和尊形壶,济南广智院街出土的“永元九年(97年)堂狼造作”洗(这件出自宋元时期窖藏,可能为当时收藏品),章丘东平陵出土的“延平元年(106年)堂狼造作”洗,兰陵磨山镇出土的“延

熹元年(158年)造作工”洗。蜀郡器有安丘管公乡出土的凤鸟纹和“王口作”洗;兰陵柞城出土的鼎纹洗,鹿和鹭纹及“蜀郡董氏造宜侯”洗,凤鸟、鼎纹及铭文“武氏造作吉”洗。

湖南地区的朱提堂狼器仅吉首发现一例阳嘉洗。蜀郡器则有湖南汝城城关镇出土的双鱼和“蜀郡成都何师作富”洗,桃源西安镇出土的羊纹洗,安化苍场乡出土的“蜀郡董是造作”洗,吉羊纹洗,常德东江乡出土的凤鸟纹耳杯和西王母耳杯。

浙江地区仅有蜀郡器,有绍兴金刚庙出土的“蜀郡成都作”双鱼洗,另几件双鱼纹“富贵昌宜侯王”洗可能也是蜀郡造作。

总体而言,蜀郡器的对外流通在数量方面远超朱提堂狼器,在地域方面也比朱提堂狼器更广。从流行时间上看,朱提堂狼器的向外流通大致集中在东汉早期至东汉中期。而湖南常德东江乡、安化苍场乡等所出蜀郡器的时代在东汉晚期。《秦汉金文录》著录一件羊纹洗,时代为建安二年(197年)。安徽宣城外贸巷M2出土一件“董晃作”鹿纹洗,墓葬时代为三国西晋。可知蜀郡器在汉末三国时期仍有制作和向外流通。

除了蜀郡器外,长江中游器在东汉中期开始

兴起^②,且向外流通。如山东兰陵柞城出土“江陵”制作的“元和四年(87年)”铜壶,双鱼和钱币纹洗^③;安徽合肥西郊乌龟墩出土洗,内底有双鱼纹和“五铢”钱币纹^④;江苏丹阳东汉墓出土,圆壶肩刻三角锯齿和凤鸟纹,盆内底为双鱼和五铢钱图案^⑤;山东章丘东平陵故城出土盆,内底模铸双鱼和“大泉五十”^⑥;广东德庆大辽山出土碗,内底为五铢纹^⑦;江西南康荒塘村所出碗^⑧,内底亦为五铢纹。因此,蜀郡器和长江中游器在东汉中期的大量对外流通,大大侵占了朱提堂狼器的外需空间。

朱提堂狼器衰落的内因便是发生在朱提堂狼一带的战争。据《后汉书·南蛮西南夷列传》载,“(延熹)四年(161年),犍为属国夷寇郡界,益州刺史山昱击破之,斩首千四百级”。战争发生在朱提堂狼境内。另一次则严重波及整个云贵境内,“灵帝熹平五年(176年),诸夷反叛,执太守雍陟。遣御史中丞朱龟讨之,不能克。朝议以为郡在边外,蛮夷喜叛,劳师远役,不如弃之。太尉掾巴郡李颺建策讨伐,乃拜颺益州太守,与刺史庞芝发板楯蛮击破平之,还得雍陟。颺卒后,夷人复叛”。目前所见朱提堂狼器时代最晚一件为175年的铜洗,很可能这场战乱最终摧毁了朱提堂狼器的生产体系。

附表

纪地类朱提堂狼器一览

器名	铭文(内底,阳文)	纹饰(内底)	时代	出处	备注
洗	建初元年堂狼造	双鱼	76年	《昭通文物藏品图录》	云南昭通甘河村出土
洗	建初四年朱提造作	双鱼	79年	《四川文物》1988年第4期	四川宜宾南广乡出土
洗	建初八年堂狼造		83年	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	
双耳锅	建初八年朱提造作	双鱼	83年	《西楼文选》	云南昭通郑家山出土
洗	元和元年堂狼造		84年	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》(2000卷)	重庆忠县老鸱冲墓地出土
洗	元和三年堂狼造		86年	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	
洗	堂狼作元和三年造		86年	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	
洗	元和四年堂狼造		87年	《朱提堂狼铜洗考》	云南省博物馆藏
洗	元和四年堂狼造		87年	《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·	故宫博物院藏
洗	章和元年堂狼造		87年	《秦汉金文录》	
洗	章和元年堂狼造	双鱼	87年	《古文字研究》第十九辑	
洗	章和元年堂狼造作		87年	《广汉文物艺术精粹》	四川广汉三水落经村出土
洗	章和二年堂狼造		88年	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	
洗	章和二年堂狼造作		88年	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	
洗	永元元年朱提堂狼铜官造		89年	《四川文物》2009年第1期	四川通江县博物馆藏
洗	永元二年堂狼造		90年	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	
洗	永元二年堂狼造		90年	《文物》1983年第10期	山东兰陵柞城遗址出土

(续附表)

器名	铭文(内底,阳文)	纹饰(内底)	时代	出处	备注
洗	永元二年堂狼造		90年	《四川文物》2009年第3期	贵州兴义万屯出土
洗	永元二年朱提堂狼		90年	《昭通文物藏品图录》	云南昭通诸葛营出土
洗	永元三年堂狼造		91年	《陶斋吉金录》	
洗	永元四年堂狼造		92年	《昭通田野考古》	云南大关岔河崖墓出土
洗	永元四年堂琅口	鹭和鱼	92年	《秦汉金文录》	
盘	永元五年堂狼		93年	《西楼文选》	云南昭通城北出土
洗	永元六年堂工		93年	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	
洗	永元九年堂狼造作		96年	《文物》1996年第1期	山东济南广智院街出土
洗	永元十二年堂狼造		100年	《文物》1995年第7期	湖北咸丰阳洞区出土
洗	永元十三年堂狼口	鱼、鹭	101年	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	
洗	永元十三年堂狼		101年	《秦汉金文录》	
洗	永元十三年堂作工		101年	《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·河南卷》	河南镇平出土
洗	元兴元年朱提造作		105年	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	
洗	元兴元年堂狼作		105年	《考古与文物》1983年第4期	陕西勉县褒城镇出土
洗	延平元年堂狼造作	双鹭	106年	《四川文物》1993年第6期	四川宜宾南广乡出土
洗	延平元年朱提造工	双鱼	106年	《秦汉金文录》	
洗	延平元年堂狼造作	双鱼	106年	《文物》1997年第4期	山东章丘东平陵故城出土
洗	永初元年堂狼造	鱼、鹭	107年	《秦汉金文录》	
洗	永初元年堂狼朱提造		107年	《秦汉金文录》	
洗	永初元年堂狼造作牢		107年	《秦汉金文录》	
洗	永初元年堂狼造作		107年	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	
洗	永初二年堂狼造作		108年	《昭通学院学报》2018年第1期	云南禄丰张通村出土
洗	元初三年朱提造作工	鹭和鱼	109年	《巴渝藏珍——重庆市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文物精品图录》	重庆万州区董家乡出土
洗	元初五年堂狼造作口		111年	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	
双耳锅	延光元年朱提作		121年	《四川文物》2009年第3期	贵州安龙大坪村出土
洗	延光二年朱提造		123年	《昭通田野考古》	云南大关黄葛乡太平村征集
洗	延光三年堂狼造作		124年	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	
洗	永建元年朱提造	双鱼	126年	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	
洗	永建元年朱提造	鱼、鹭	126年	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	
洗	永建元年朱提造		126年	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	
洗	永建四年朱提造		129年	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	
洗	永建五年朱提造作牢		130年	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	
洗	永建五年朱提造		130年	《昭通文物藏品图录》	云南昭通诸葛营村出土
洗	永建六年朱提造作工	双鱼	131年	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	
洗	永建六年堂狼造		131年	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	
洗	永建七年朱提造一		132年	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	
洗	永建九年堂狼造	双鱼	134年	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	实为阳嘉三年
洗	阳嘉二年朱提造作上牢工		133年	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	
洗	阳嘉三年朱提造作		134年	《湖南考古辑刊》	湖南吉首河溪镇出土
双耳锅	阳嘉四年堂狼造作牢吉羊		135年	《西楼文选》	云南昭通征集
洗	阳嘉四年朱提造		135年	《朱提堂狼铜洗考》	

(续附表)

器名	铭文(内底,阳文)	纹饰(内底)	时代	出处	备注
洗	阳嘉四年朱提造作		135年	《云南省志·文物志》	云南省博物馆藏
洗	永和元年朱提造作一	鱼、鹭、五铢	136年	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	
洗	永和元年堂狼造	双鱼	136年	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	
洗	永和二年朱提造作一		137年	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	
洗	永和三年堂狼造		138年	《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·青铜生活器》	故宫博物院藏
洗	永和四年朱提造作一		139年	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	
洗	永和四年堂狼造		139年	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	
洗	永和六年朱提堂狼工	鱼、鹭、五铢	141年	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	
洗	永和六年堂狼造		141年	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	
洗	汉安元年朱提造	双鱼	142年	《西楼文选》	
洗	汉安元年堂狼造作		142年	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	
洗	汉安元年堂狼造作工	双鱼	142年	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	
洗	汉安二年朱提造工		143年	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	
洗	汉安二年朱提堂狼造		143年	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	
洗	汉安二年堂狼造作		143年	《大关县志》	
洗	汉安二年朱提造	鱼、鹭	143年	《昭通县志》	
洗	汉安三年朱提造		144年	《昭通文物藏品图录》	云南大关县黄葛乡征集
洗	汉安三年朱提造		144年	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	
洗	建康二年堂狼造		145年	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	
卮	和平二年堂狼造	焊五铢六枚	151年	《文物》1992年第9期	湖北江陵城唐家人山出土
洗	永兴元年堂狼造	鹭和鱼	153年	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 《中国青铜器全集·秦汉卷》	辽宁省博物馆藏 (二者是否同一器,尚待确认)
洗	永兴元年朱提造		153年	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	
洗	永兴二年堂狼造作工		154年	《秦汉金文录》	
洗	永寿二年堂狼造		156年	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	
盘	永寿二年朱提	鹭、鱼、钱币	156年	《中原文物》2018年第4期	山东寿光纪国故城出土
洗	延熹二年堂狼造		159年	《安徽通志》	
洗	延熹四年朱提堂狼造作	双鱼	161年	《四川文物》2009年第3期	贵州安龙大坪村出土
洗	建宁年堂狼造		168-172年	《朱提堂狼铜洗考》	云南省博物馆征集
洗	建宁二年堂狼造		169年	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	
洗	建宁三年堂狼	双鱼	170年	《朱提堂狼铜洗考》	故宫博物院藏
洗	建宁四年堂狼	双鹭	171年	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	
洗	堂狼造作吉羊			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	
洗	熹平四年堂狼		175年	《两汉经济史料论丛》	

说明:金石学家所著录的器名不一定准确,但由于这些著录重点在铭文或纹饰,目前尚无法从器形方面进行分辨,故暂维持原名。

注释:

①端方:《陶斋吉金录》,朝华出版社,2018年;冯云鹏、冯云鹤:《金石索》,西泠印社出版社,2016年;容庚:《秦汉金文录》,中华书局,2012年。

②陈直:《两汉经济史料论丛》,陕西人民出版社,1958年;

汪宁生:《云南考古》(增订本),云南人民出版社,1992年;孙太初:《朱提堂狼铜洗考》,《云南青铜论丛》,文物出版社,1981年;方国瑜: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,中华书局,1984年;徐正考:《汉代铜器铭文综合研究》,作家出版社,2007年。

③本文所说的东汉早期指光武帝至章帝时期,东汉中期为和帝至桓帝时期,东汉晚期为灵帝至献帝时期。

④刘心健、刘自强:《山东苍山作城遗址出土东汉铜器》,《文物》1983年第10期。

⑤鸣笙:《汝城出土汉蜀郡成都双鱼铜洗》,《湖南考古辑刊》第三集,岳麓书社,1986年。

⑥寿县博物馆:《安徽寿县发现汉、唐遗物》,《考古》1989年第8期。

⑦熊传新:《湖南发现的古代巴人遗物》,《文物资料丛刊》(7),文物出版社,1983年。

⑧绍兴市文物管理处考古组:《浙江绍兴市发现东汉窖藏》,《文物》1991年第10期。

⑨成都博物馆:《花重锦官城——成都博物馆历史文物撷珍》,四川美术出版社,2018年。

⑩葛介屏:《肥东、霍丘县发现汉墓》,《文物》1959年第10期。

⑪刘霞:《南阳市博物馆收藏的几件汉代刻铭铜器》,《中原文物》2004年第5期。

⑫杨平:《西安北郊高庙北村出土的一批汉代铜器》,《文博》1986年第2期。

⑬赵康民:《西安洪庆堡出土汉愍儒乡遗物》,《考古与文物》1984年第6期。

⑭高次若:《宝鸡市博物馆藏青铜器介绍》,《考古与文物》1991年第5期。

⑮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写作小组:《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》,《考古》1972年第5期;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:《广西合浦文昌塔汉墓》,文物出版社,2017年;广西合浦县博物馆:《广西合浦县母猪岭汉墓的发掘》,《考古》2007年第2期;广东省博物馆:《广东德庆大辽山发现东汉文物》,《考古》1981年第4期。

⑯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、合浦县文物管理局:《2009—2013年合浦汉晋墓发掘报告》,文物出版社,2016年;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、合浦县博物馆:《广西合浦县岭脚村三国墓发掘报告》,《广西考古文集》(第二辑),科学出版社,2006年;《合浦风门岭汉墓——2003—2005年发掘报告》,科学出版社,2006年。

⑰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、广州市番禺区文管会办公室:《番禺汉墓》,科学出版社,2006年。

⑱梧州市博物馆:《广西梧州市近年出土的一批汉代文物》,《文物》1977年第2期。

⑲广东省博物馆:《广东德庆大辽山发现东汉文物》,《考古》1981年第4期。

⑳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:《广西合浦文昌塔汉墓》,文物出版社,2017年。

㉑白云翔提出“基于风格和分布”对遗物产地进行推定的方法,其核心观点即不同产地形成不同的产品类型和产品风

格,而其分布大致形成以产地为中心。若此,可以根据器物风格和分布中心来反推产地。见白云翔:《论基于风格与分布的考古遗物产地推定法》,《考古》2016年第9期。

㉒张正宁:《西昌出土东汉永和元年铭文双鱼洗》,《四川文物》1993年第4期。

㉓贵州省考古研究所:《贵州兴仁交乐汉墓发掘报告》,《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》,贵州民族出版社,1993年。

㉔宋先世、程学忠:《贵州务川新出两汉铜器》,《考古与文物》1991年第2期。

㉕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昆明市博物馆、官渡区博物馆:《昆明羊甫头墓地》,科学出版社,2005年。

㉖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文山州文物管理所、红河州文物管理所:《云南边境地区(文山州和红河州)考古调查报告》,云南科技出版社,2008年。

㉗王桂蓉:《禄丰汉代砖室墓清理简报》,《文物资料丛刊》(9),文物出版社,1985年。

㉘四川省博物馆、盐亭县文化馆:《四川盐亭东汉崖墓出土文物简记》,《文物》1974年第5期。

㉙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:《四川西昌市杨家山一号东汉墓》,《考古》2007年第5期。

㉚昭通市文物管理所:《昭通田野考古》(之一),云南人民出版社,2012年。

㉛唐金裕、郭清华:《陕西勉县红庙东汉墓清理简报》,《考古与文物》1983年第4期。

㉜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昆明市博物馆、官渡区博物馆:《昆明羊甫头墓地》,科学出版社,2005年。

㉝四川省博物馆:《四川阿坝州发现汉墓》,《文物》1976年第11期。

㉞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:《四川西昌市杨家山一号东汉墓》,《考古》2007年第5期。

㉟重庆市文物考古所、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、重庆市文物局、巫山县文物管理所:《巫山水田湾东周、两汉墓葬发掘简报》,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》(2000卷),科学出版社,2007年。

㊱云南省文物工作队:《云南大关、昭通东汉崖墓清理报告》,《考古》1965年第3期。

㊲昭通市文物管理所:《昭通田野考古》(之一),云南人民出版社,2012年。

㊳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昆明市博物馆、官渡区博物馆:《昆明羊甫头墓地》,科学出版社,2005年。

㊴贵州省考古研究所:《贵州兴仁交乐汉墓发掘报告》,《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》,贵州民族出版社,1993年。

㊵张正宁:《西昌出土东汉永和元年铭文双鱼洗》,《四川文物》1993年第4期。

- ①晏满玲:《泸州地区崖墓刍议》,《四川文物》2009年第4期。
- ②贵州省考古研究所:《贵州兴仁交乐汉墓发掘报告》,《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》,贵州民族出版社,1993年。
- ③昭通市文物管理所:《昭通田野考古》(之一),云南人民出版社,2012年。
- ④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黔西县文物管理所:《黔西绿化乡汉墓发掘简报》,《贵州田野考古报告集》,科学出版社,2014年。
- ⑤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:《贵州兴义、兴仁汉墓》,《文物》1979年第5期。
- ⑥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、合浦县博物馆:《合浦风门岭汉墓——2003—2005年发掘报告》,科学出版社,2006年。
- ⑦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:《广西合浦文昌塔汉墓》,文物出版社,2017年。
- ⑧梁明燊:《广东临高县出土汉代青铜釜》,《考古》1964年第9期;广东省博物馆:《海南岛发现汉代铜釜》,《文物》1979年第4期;郝思德、陈佩:《临高县文连汉代铜釜》,《中国考古学年鉴·2002》,文物出版社,2003年。
- ⑨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、开县图书馆:《四川开县红华村崖墓清理简报》,《考古与文物》1989年第1期。
- ⑩王桂蓉:《禄丰汉代砖室墓清理简报》,《文物资料丛刊》(9),文物出版社,1985年。
- ⑪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昆明市博物馆、官渡区博物馆:《昆明羊甫头墓地》,科学出版社,2005年。
- ⑫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:《四川西昌市杨家山一号东汉墓》,《考古》2007年第5期。
- ⑬贵州省考古研究所:《贵州兴仁交乐汉墓发掘报告》,《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》,贵州民族出版社,1993年。
- ⑭重庆市文物考古所、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、重庆市文物局、巫山县文物管理所:《巫山水田湾东周、两汉墓葬发掘简报》,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》(2000卷),科学出版社,2007年。
- ⑮昭通市文物管理所:《昭通田野考古》(之一),云南人民出版社,2012年。
- ⑯昭通市文物管理所:《昭通文物藏品图录》,云南人民出版社,2014年。
- ⑰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昆明市博物馆、官渡区博物馆:《昆明羊甫头墓地》,科学出版社,2005年。
- ⑱昭通市文物管理所:《昭通田野考古》(之一),云南人民出版社,2012年。
- ⑲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:《贵州兴义、兴仁汉墓》,《文物》1979年第5期。
- ⑳贵州省博物馆:《贵州安顺宁谷发现东汉墓》,《考古》1972年第2期。
- ㉑转引自张合荣:《夜郎青铜文明探微——贵州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器研究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8年。
- ㉒刘心健、刘自强:《山东苍山柞城遗址出土东汉铜器》,《文物》1983年第10期。
- ㉓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、个旧市博物馆:《个旧市黑蚂井墓地第四次发掘报告》,科学出版社,2013年。
- ㉔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、贵州省赫章县文化馆:《赫章可乐发掘报告》,《考古学报》1986年第2期。
- ㉕贵州省博物馆:《贵州赫章县汉墓发掘简报》,《考古》1966年第1期。
- ㉖昭通市文物管理所:《昭通田野考古》(之一),云南人民出版社,2012年。
- ㉗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玉溪市文物管理所、江川县文化局:《江川李家山——第二次发掘报告》,文物出版社,2007年。
- ㉘吴小平、蒋璐:《汉代刻纹铜器考古研究》,浙江大学出版社,2015年。
- ㉙安康水电站库区考古队:《陕西紫阳白马石汉墓发掘报告》,《考古学报》1995年第2期。
- 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江三峡工作队、巫山县文物管理所:《巫山双堰塘遗址发掘报告》,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》(1998卷),科学出版社,2003年。
- ㉛吴镇烽、罗英杰:《记武功县出土的汉代铜器》,《考古与文物》1980年第2期。
- ㉜在武汉江夏庙山、宜昌土城、宜都陆城、长阳、咸丰县、恩施、郴州同和乡、安化县苍场乡、桃源兴隆街、桃源大池塘村、湘西吉首乾州街道、吉首河溪镇、慈利石门、张家界、古丈白鹤湾、桃源夷望溪镇,发现一批铜洗、圆壶、罍于。纹饰有模铸的双鱼或钱币纹,也有细线篆刻的凤鸟纹和鱼纹。铭文多为“富贵昌宜侯王”之类吉语。显然,纹饰和吉语包括器型均与朱提堂狼或者蜀郡不同,推断为当地制作。
- ㉝刘心健、刘自强:《山东苍山柞城遗址出土东汉铜器》,《文物》1983年第10期。
- ㉞安徽省博物馆筹备处清理小组:《合肥西郊乌龟墩古墓清理简报》,《文物参考资料》1956年第2期。
- ㉟镇江市博物馆、丹阳县文化馆:《江苏丹阳东汉墓》,《考古》1978年第3期。
- ㊱宁荫棠、牛祺安:《山东章丘市东平陵故城出土汉代铜器》,《文物》1997年第4期。
- ㊲广东省博物馆:《广东德庆大辽山发现东汉文物》,《考古》1981年第4期。
- ㊳赣州地区博物馆、南康县博物馆:《江西南康县荒塘东汉墓》,《考古》1996年第9期。